

主编 郝时远 朱 伦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Translation Series

民族学人类学译丛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Conflict in and after the Soviet Union: The Mind Aflame*

# 苏联

# 及其解体后的族性、 民族主义及冲突

## —— 炽热的头脑

[俄] 瓦列里·季什科夫/著

姜德顺/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 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

[俄] 瓦列里·季什科夫/著

姜德顺/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俄罗斯)瓦列里·季什科夫著;姜德顺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1108-619-5

I. 苏… II. ①瓦…季…②姜… III. ①民族问题—研究—苏联②民族问题—研究—独联体 IV. D75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4514号

##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

---

- 策 划 戴佩丽  
作 者 瓦列里·季什科夫  
译 者 姜德顺  
责任编辑 方 圆  
封面设计 乌日恒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9.375  
字 数 486千字  
印 数 2000册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19-5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 序

中国的翻译历史十分久远,先秦文献有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互动关系的记述,就包括了翻译的桥梁作用,即“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sup>①</sup>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翻译不仅在“五方之民”及其后裔的漫长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沟通理解作用,而且也是中国认识世界、引进域外思想文化的工具,其中佛教经典的翻译可谓最大的工程。

近世“西学东渐”是中国社会步入世界现代进程中的巨大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屈辱中开始重新认识世界,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魏源进而增修汇编的《海国图志》,开启了中国近代译介西学的先河,即所谓“中国知西政之始”。译介西学是中国仁人志士从过去视域外技艺为“奇技淫巧”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变革,而甲午之后则成为中国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之急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的推动和身体力行,使“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内容逐步涵盖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其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也渐次介绍到中国。如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1903年,林纾、魏易根据英译本,翻译的德国民族学家哈伯兰的《民种学》(Ethnology),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均属西方民族学、人类学著述进入中国的开山

---

<sup>①</sup> 《礼记》,“王制”,第五,引自《十三经注疏》。

译作。

中国虽然有编写民族志的历史传统,但是作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化发展则仅有百年的历史。在推进这些源自西方的学科本土化发展进程中,译介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代表作,一直是推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建设之一。因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早期开拓者和著名前辈,往往也是从译介国外民族学与人类学著名篇开始其学术生涯,而这一治学特点也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推进学科建设、发展学术事业的自觉传统。百年来,中国学界对国外民族学与人类学著作的翻译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偏重,但是可以说从未间断,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理论流派和前沿话题,基本上为国内学界所熟悉,并在本土化运用中发挥着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的译介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的历史经典、现代新作不断为学人所译介,如1979-1994年的《民族译丛》杂志即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术翻译载体。同时,国外民族学、人类学著作的翻译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有30多家出版社相继推出了数以百计的民族学、人类学译著,而且近年来呈现系列性刊布的发展趋势。这些译著涉及面之广,不仅涵盖了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经典民族志,而且涉及了民族学、人类学的诸多分支学科。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在与世界互动进程中实现发展。中国的学术事业也是如此,在持续和不断深入的国际交流中走向繁荣。其中译介国际学术的最新成果,是实践学术交流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面对着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其中民族问题即是具有普遍性的领域之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重要的智力源泉。民族问

题历来与诸种社会问题渗透交叉的事务,无论是对民族大千世界而言,还是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领域,以及人口、宗教、语言、人权、生态、城镇化等专门话题,都是民族问题的题中之意。而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分支化发展,与其他学科的不断交融,其中必然地包括了适应民族问题普遍性、复杂性、长期性、重要性和国际性特点的意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民族学人类学译丛》,基本主题属于民族政治学或政治人类学范畴,突出了民族(nat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族性(ethnicity)、族群(ethnic group)理论概念的研究特点,包括了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少数人权力(minority rights)和前苏联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政治人类学导论和世界范围族群口径的分类资料,其目的是为了就国内诸多学科所关注的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多元文化、公民身份、少数人权力的研究和有关“族群”概念的理解、争论和应用,提供更多的学术参考。在这方面,相关译者和出版社已经推出了一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这套丛书将进一步就同类话题展开更广泛的学术探究,以满足国内学界不断增强的学术需求。

毫无疑问,在学术翻译中,概念体系的对应或新构历来存在着困扰。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曾面对近世“西学东渐”不胫而走的大量新概念所说的那样,“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骘骘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sup>①</sup>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对“民族”、“族群”这类概念的研究、阐释和论争,也是如此。所以,在这套丛书翻译过程中,基本概念问题依然是难

<sup>①</sup>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7页。

点,期间虽然力求统一,但是每一个译者对同一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且直接关系到对其论理的理解。因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要求译者尽可能地保留一些基本概念的原文,以使读者全面准确地理解原作的意思,我想这也应该成为学术翻译的基本规范。

概念及其定义,是对相关要素、特征的概括和理论阐释的支点。因此,沃勒斯坦认为: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事实上是概念的翻译问题,因为社会科学的讨论往往以概念为核心,而概念又是经过作者自己清晰界定和应用的。概念是公诸众人的意义参照,也是资料、数据的综合描述,是对现实世界的分类。同时,由概念引起的矛盾也比比皆是<sup>①</sup>。在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交流中的概念引进或再造,早已不是王国维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可以比照的了。然而,虽然“犹不得不造新名”已属常态,但是以“新名”取代“旧名”却需要斟酌。人们在全球化时代对“本土知识”的眷恋,固然反映了对“我是谁”的重新寻觅、伸张甚至构建的保守,但是又何尝不是力图将“本土知识”推向世界的自尊、自信?

在一个承认甚至逐步崇尚文化多样性的时代,学术研究的视角也呈多样化的散射,全球化的进程给学人更加多样的选择。一系列新的术语、概念正在纷至沓来,为学人提供了新视野、新理念甚至可以标新立异加以发挥的新观点。或许它们的产生符合发达的、后现代的西方社会时代特征,甚至它们也正在被谋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用来证明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但是,作为中国学者的首要学术责任是立足于国情实际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对西方话语的“翻译”或“西式中文”的论说甚至削足适履的套用。“西来之说”的“本土化”固然重要,因为它体现了吸收与借鉴的必然要求;

<sup>①</sup> 转引自:【美】麦克洛斯基等:《社会科学的措辞》,许宝强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83页。

而“本土之说”的国际化又何尝不是这个过程的题中之意？我想这应该是译介的意义。

中国学界译介外国学术著作将会是一个长久持续的学术工作，这是我们与国际学术界交流沟通的重要桥梁，也是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也许有一天，中国的学术著作，包括民族学、人类学的著作会被外国学术界所译介，虽然这一天为时尚远。但是，译介国外学术著作能够为这一天更早的到来创造条件则毋庸置疑。因此，这项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需要指出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时逢2009年第16届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大会在中国举办，它对国内学术界更多的了解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使国外学者认识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开放和发展的取向，无疑也大有助益。为此，我们感谢诸位译者辛勤的劳动，也感谢出版社为推出这套丛书做出的努力。同时，也期待着学界同仁、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指正。

郝时远

2008年11月12日于北京



## 致 谢

许多人和机构已经卷入这项做得到的研究，并使本书得以出版。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研究人员与我分享了这个领域的经历和研究成果，不幸的是，我所能使用的，仅仅是这些成果中很小一部分。米哈伊尔·古博格罗（Mikhail Guboglo）和列奥卡季娅·德罗彼热娃（Leokadia Drobi-zheva）容许我提问，并让我使用了他们在俄罗斯各共和国所做那些社会学调查的成果，而这些调查只是一些国际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谢尔盖·萨沃斯库尔（Sergai Savoskul）和阿拉·金兹伯格（Alla Ginzburg）在中亚所做的社会学调查，为撰写本书第六章提供了主要来源。协同准备本书第四和第五章的阿纳托利·亚穆斯科夫（Anatoly Yamskov），也是本书手稿一位最有用的读者。谢尔盖·萨沃斯库尔和阿比拉别克·阿桑卡诺夫（Abilabed Asankanov）帮助准备了第七章。其他许多人提出建议和参考意见。几位杰出的同行则阅读或批评了手稿，我想提到的他们当中最杰出的几位是：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博赫丹·纳哈吉罗（Bohdan Nahajlo）、唐纳德·霍罗维茨（Donald Horowitz）、盖尔·拉皮德斯（Gail Lapidus）、丹·史密斯（Dan Smith）以及鲁道夫·施塔韦哈根（Rodolfo Stavenhagen）。对我所有的同行们，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在我广泛旅行于亚美尼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以及俄罗斯联邦各共和国——巴什基尔、车臣、楚

瓦什、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北奥塞梯、鞑靼斯坦、雅库特——期间，各个地方的专家们、政治家们以及积极分子帮助了我，并提出建议。我于1993年建立了“民族学监测与早期警报网”（Network of Ethnological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EAWARN），这一机构是对于处理苏联解体之后族际冲突加以研究的一个国际项目的一部分，从那时以来，它已演变成一个丰富对话的机构，可让关心各自国家和地区的族裔—政治问题的主要专家们使用。本书也从所有这些人的见解中获益。

最艰苦的任务是，本书以并非我母语的语言所写成。只有第九和第十章是由斯蒂芬（Stephen）和埃塞尔·邓恩（Ethel Dunn）为我做专业翻译，还有第六章那短短的译本原先是翻译成一篇会议论文发表在雅科夫·罗伊（Yaacov Ro'i, 1995）所编辑的一部书中。其余部分都是我用自己不擅长的英语所撰写，多承两位语言编辑苏珊·赫依维克（Susan Høivik）和林恩·帕克（Lynn Parker）修改润色；前者以其广博的学识和能力所做工作实不止于语言编辑。扬·托勒·克鲁特森（Jan Tore Knutsen）为出版之前组织文本的最后阶段予以很大帮助。

几家机构支持了我的研究和写作。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起初签约让我做此项研究，希望我尽早报答，但也对我复命如此迟缓显示出耐心与理解。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予以资金支持，使我有可能是进行关于族裔暴力和冲突的研究，尤其是让我能够旅行、搜集资料以及请人协助。自1994年以来，我有幸作为设在奥斯陆的国际和平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缩写为PRIO）的兼职高级研究顾问，得以使用其设施并得到帮助而完成这部著作。第七和第十二章这两个较早的部分曾发表于该国际和平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和平研究期刊》1995年第32卷第2

号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5, vol. 32, no. 2) 和《安全对话》1995年第26卷第1号 (*Security Dialogue*, 1995, vol. 26, no. 1) 上。第十一章这一简短文本发表在理查德·卡普兰 (Richard Caplan) 和约翰·普费弗 (John Pfeffer) 所编辑的《新欧洲的民族主义》 (*The New Europe's Nationalism*, 199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一书中。第十三章则对《科纳综述》 (*The Kona Statement*) 有所借用, 该“综述”是由“族际关系项目” (the Project of Ethnic Relations) 所组织的一次会议的成果, 当时, 唐纳德·霍罗维茨、威廉·普法夫 (William Pfaff) 以及我本人是撰写有关冲突决议的该报告的主要撰稿人。

对上述所有机构和个人, 谨致谢意。

瓦列里·季什科夫

## 名称、名字及类别的用法

命名是用语言论述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通过命名，我们把反映着辨认和力量变化部署的某个意义和某种信息传达出来。决非偶然的是，近年来深刻的社会及地缘政治转型已引起空前未有的重新命名过程，从全球到地方甚至到个人，各级别莫不如此。大多数此种重新命名尤其是正式的国家名称、首都名称，以及对于合法化和承认而言至关重要的其他变化，均已包括在国际规约、外交文件、地图和地图册以及基本的参考文献中。但这些名称和名字并非既成事实，要把新词汇引入大众思想、政治行话以及学术文本中，尚需时日。许多定义还有待准确反映新的现实，正经历着岁月的测试以及选择过程。而一些定义则依然从属于意识形态的操纵，而且导致纷争不已。这个过程远未结束，而且在苏联解体后的政治及文化布局中，新的名称还在不断突然出现。最近的变化发生在我撰写这篇引言那天，即1996年4月23日，当天，乌克兰西部一个城市利维夫（Lviv）的市议会批准了乌克兰全国议会的一项建议，以车臣领导人焦哈尔·杜达耶夫（Dzhokhar Dudayev）的名字为该市一条街道重新命名。所讨论的这条街道先前是用俄罗斯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名字做街名。迄今为止，由于命名和标识都是某个人创意和决定的结果，我觉得对于正在过渡的术语和名称有我自己的选择，并以此阐述我的说明，这才合适。

我并未选用“苏联解体后的空间”（post-Soviet space）这一术语，皆因它让我听来有些模糊，它缺乏结构或拟人化。相反，

我把“前苏联”（the former Soviet Union）当作更为适当的词语来写，尽管该词还是个受时间限制的类目。显然，该词并不能用于更为遥远的历史观点，正像当今某人理性一些就不能说什么“前奥匈帝国”或“前加洛林帝国”一样。我用该术语来包含昔日苏联所有各个部分，包括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我也很明白现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政治家们和知识分子反对这一用法。有趣的是，种种国际规约似乎在这个问题上认输了，而且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排除在前苏联领土之外。另外，美国国务院于1992年决定避免官方使用“独立国家联合体”（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作为一个国际联盟的名称，因此就暗中质疑（或至少是不协助）苏联解体后各国的重新统一。相反，有人却提议把“新兴独立国家”（the Newly Independence States）当作适当的术语。我对此种分类也觉得不舒服，那是由于下述非政治原因：它仅仅是不合乎我在本书中所涉及的文化及冲突的范围而已。我更属意的术语可能是欧亚（Eurasia）（除了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之外的前苏联所有部分），然而不幸，我发觉自己只是极少数专家之一，这些专家认为，用该术语既有前途，用来标示昔日苏联大部分领土，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可令人接受。

我觉得牵涉到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而奋斗的其他那些词语发明，都不成功。例如，俄罗斯政治及学术用语中广为使用的“近境外”（near-abroad）这一术语就是如此。实际上这个短语——*blizhnee zarubezhie*<sup>①</sup>——同时出现，并未经由任何政治方面驱动而判决。只是最近，它才带上了复仇思想，而且令一些人猜疑，这些人把俄罗斯周围地区看作不同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国外。该术

① 本书原著中夹有相当多以拉丁字母拼写、斜体排印的俄语词语，在有把握的前提下，译者尽量将它们还原为西里尔字母拼写的俄语词，并置于括号中位于斜体拉丁字母原文之后，无把握或查找不到者则不勉强。敬请读者鉴谅。——译者

语不被使用的另一原因在于其语境不正确（对俄罗斯而言中国和挪威也是“近境外”）。把此种现实称为“近期的或新近的国外”也许更为准确，但这也许还是（就前苏联而言）一个短命的类别：它能被人们当作新词继续叫上多久呢？

另一个所牵涉到的问题是，如何对俄罗斯周围各个新国家主要无名分的（non-titular）操俄语者那部分人口归类。他们依然被叫做“操俄语（Russian speaking）（*russkojazychnoje*）人口”或“俄国族”（ethnic Russians）（*etnicheskie rossijane*, этнический россияне），我发现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在各个新国家里，毕竟有相当大比例的这种有名分者（titulars）还是操俄语者（Russian speaker），而“俄罗斯人”（Russian）是表示国籍的用语中通行的公民类别。在这里，已经使用了在政治上更不敏感而且更加确切的类别——新的散居在外者（new diaspora）和新的少数者（new minorities），尽管我对苏联解体后各国的少数者这一概念的用法有所保留，在那些国家，有许多大的、安置良好的族裔社群并不适用于这个类别及其价值论语境。对于爱沙尼亚、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以及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尤其是这样。

关于一些新国家和内部自治的名称，最早的方式可能是使用官方制定并在国际上承认的术语。但至少有两个困难。首先，许多叙述和经验数据回到变化发生之前那个时代，因此，要把“土库曼”（*Turkmenia*, Туркмения）写成“土库曼斯坦”（*Turkmenistan*,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就没有历史记载，当时根本没有这种名称，就像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历史并把它称为“摩尔达维亚”（*Moldavia*）或“摩尔多瓦”（*Moldova*）一样。其次，有些重新命名在语言方面和政治方面还不是成功的事情，它们还未被代表着被重新命名的那些人所接受。在这种状态下，我就决定了行使特权而自行做主。因此，我选择了在有些情况下使用古老的拼写——对于白俄罗斯（Belo-

russia)、吉尔吉斯 (Kirgizia)、摩尔达维亚以及土库曼 (Turkmenia) 而言,我都是这样处理。本书并非外交文件文本,而且我宁愿以更为接近世俗大众和政治家们日常用语的方式,反映正在进行的术语变化过程。还有,据我所知,一些新名字在精英们当中并不使用;在有些国家,在此问题上存在着巨大裂痕。例如,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普通人都继续使用“Kirgizia”(Киргизия, 吉尔吉斯)这个名称和“Kirgiz”(Киргиз, 吉尔吉斯人)这个名字,直率地反对不怎么现代化的民族主义者们,而后者则随着20世纪早期急剧变化的潮流,强人所难地想方设法推广一种更为“正确的”拼写。此外,有些变化是针对早已制定的俄语语言学规范而来:对于那些新国家中的操俄语者,难以适应这种新语言。另一方面,我敢肯定有些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它们要扎根于大众的心目和语言中,需要的仅仅是时间。“Moldova”(Молдова, 摩尔多瓦)和“Belarus”(Белорус, 白俄罗斯)这种词在母语中听上去更好,而且也被俄罗斯人广为接受。“Turkmenistan”和“Kyrgyzstan”这种词则经由持续的政治及理性努力可以被广泛使用,或者说,也许一个折中的版本比如“Kirgizstan”最终会使它本身形成。

迅速转变为新名称的一个明显例证就是“Tataria”(Татария, 鞑靼)这一个案,当时,公众对主权问题的强烈争论,使得用“Tatarstan”(Татарстан, 鞑靼斯坦)这一新名字指称该共和国广泛流行。这就是在此使用这一术语的原因。但同时,我宁愿继续使用“Bashkiria”(Башкирия, 巴什基尔)而非“Bashkortostan”〔Башкортостан, 巴什科尔托斯坦〕,因为这个共和国的本族精英们以用俄语说出听起来相当不舒服的一个名称,替代了老的那个——而俄语是那里绝大多数人口所说的语言。还可以引用一些同样的例子,比如使用“Tuva”(图瓦)(而非Тува)、“Mari”(马里)(而非Mari-El)以及“Yakutia”

(雅库特) (而非“萨哈”〔*Sakha*〕) 作为各共和国的名字就引起了争论。

同时, 我已希望引入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语言上的新释义: 把“Russia” (俄罗斯) 这个国家的名称正确拼写为“Rossia”。尽管按长期传统是用字母“u”书写该词, 对于指族体的词则是“Russian”, 但这两个词被当成派生于同一个词干而意义深远地扭曲, 总有其理由。实际上, 这两个独特的词存在于俄罗斯语言中: 一个是作为国家名字的“Rossia” (Россия, 俄罗斯), 另一个则是指人们及其语言和文化的名字的词“*russkii*” (Русский, 俄罗斯人、俄语)。这种含混的语言用法导致了——而且还在导致——广泛流行的误解和错误的含义。对于外界而言, 来自俄罗斯的非俄罗斯人族体可以称为“Russians” (俄国人), 然而, 这些人自己并不这样认同, 而宁愿认同于“Rossians” (*rossiyane*, Россияне, 俄国人)。把车臣的联邦军队叫做“俄罗斯部队” (the Russian army 或 Russian military), 或仅仅叫做“俄罗斯人” (Russians), 直接牵涉族裔投影——事实上, 在该部队的新兵当中有许多不同民族 (nationalities) 的人。摧毁了格罗兹尼的俄罗斯将军列夫·罗克林 (Lev Rokhlin), 可能正好也是被人当作俄罗斯族的犹太人 (a Jew as an ethnic Russian)。这是一个敏感问题, 因为当把所表达的俄罗斯的法西斯主义 (也就是在俄罗斯的法西斯主义) 翻译成“*russkii fascism*” (Русский фашизм) 时, 受到俄罗斯族 (ethnic Russians) 强烈拒绝——即使他们可以在这个国家为极右派提供主要来源也是如此。因此, “Rossia” 这个词在本书第 12 章才开始用, 我在那一章里专门把这个问题当作更为准确拼写的问题来处理, 而不是当作俄语本身的书写变化来对待。于是, 这种拼写就用于所有派生词 (Rossian Federation, authorities, army, mafia [俄罗斯联邦、俄国官方机构、俄国军队、俄国黑社会], 等等), 当然, 直接从英语引用者除外。



族体类别和族体名称（族称，ethnonyms）可以是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包括由近来的政治转型和正在变化的学术理解所引发的争论在内。我宁愿使用在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学科内被国际上所接受的术语。人们所用的族群的基本类别与族体-文化实体的地位和规模无关，此种实体在苏联及其解体之后时期的政治和学术语言中，经历了学术及意识形态的分类。我对苏联时期留下的种种遗产所做的惟一让步，涉及与“族群”（ethnic group）对等的“民族”（nationalities，复数形式）这一术语，因为这一术语不仅是日常用语，也在学术著作中使用，包括西方对世界上这个部分论述的文献也是如此。“民族”（nationalities）这一术语为我使用政治范畴例如民族政策（nationalities policy）或民族问题（nationalities issues）提供了合乎逻辑的基础。我避免使用如下一些术语，比如“national question”或者“national policy”，主要是因为我正在尝试从学术语言和正式语言中把当作一个族体范畴（ethnic category）、当作族裔民族（ethnonation）的“nation”这个术语消除掉。

在此所用的所有族体名字都是用它们在当代广泛使用（按单数排列）的拼写，不管其母语修辞和努力回归“真正的”、“可信的”名字如何，而不是用外人强加影响的那些：人类学家们都知道，大多数名字事实上都是他称的外来族名（exoethnonym）。在少量情况下，群体重新起名的过程可以产生令初创者意想不到的结果。假如从“雅库特”（Yakut）向“萨哈”（Sakha）的转变继承了该族的族称，同时该共和国又保持其原先名称“雅库恰”（Yakutia），那么，这就是族群与其地域的某种程度的分离。这对于建构公民社会可能有用，但的确不受发起这种变化那些人欢迎。同时，我鼓励为多族体的政治实体，采用充分与其主导群体相吻合的名称来命名。这样就能为居住并忠诚于某一国家的所有人构造一个共同名称，而区别于其族体标称。因此，我们就可